

程曼丽 主编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第八辑 Volume VIII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程曼丽 主编

第八辑

Volume VIII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第8辑/程曼丽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301 - 23721 - 2

I. ①北… II. ①程… III. ①新闻学 - 文集 ②传播学 - 文集  
IV. ①G210 - 53 ②G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4897 号

书 名: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八辑)

著作责任者: 程曼丽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3721 - 2/G · 377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282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邵华泽  
副 主 任：徐 泓  
委 员：赵为民 龚文庠 程曼丽 肖东发  
杨伯淑 陈 刚 关世杰  
主 编：程曼丽  
副 主 编：师曾志  
编 辑：吴惠凡

## 主 编 的 话

传播学(在中国)发展至今,引进的理论、学说多,课堂上的照本宣科多,经验层面的应用多,而学术乃至社会层面的检视与反思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克里格(Robert Craig)对传播学科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是,“由于人类的传播实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传播学科不可能被一种理论流派或体系所统辖”。他甚至认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理论不是对某个研究过程进行的阐述,而是一些围绕学术发展方向的陈述与争论。<sup>①</sup>

本辑多篇研究成果呈现的正是“学术乃至社会层面的检视与反思”以及“围绕学术发展方向的陈述与争论”。这种反思与争论并非浅尝辄止、流于表面,而是依循“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清代刘熙载)的原则,追求历史的厚重感和学理探究的深度。这也恰恰构成了本辑内容的特色。

历史的厚重感源自研究者对于史实、史料以及时代特征的全面把握和潜心解读。就本辑内容而言,它不但体现在“‘汉语新闻学’有无自己的主体性、是否已经成为存在的‘他者之脸/面容(face/visage)’?”的拷问中(王春泉),也体现在一个个扎实、详致的个案研究中。这些个案并非一味专注于“细节”或偶然性因素,而是在史料考据、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发现事物的相关性及内在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正如《论民国时期平津民营报刊营业化转型的局限》一文作者(李杰琼)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报界视为“报格”独立标杆的“营业化转型”所进行的批判性思考,通过“植根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史实爬梳与分析”,作者发现,为保障报纸的经营,对政治权力采取迎合(甚至共

---

<sup>①</sup>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等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谋)的姿态,显然已违背营业化转型的初衷。她指出:“营业性”或“营业志向”,是造成民营报刊自我标榜与新闻实践的矛盾,即“报格”断裂的原因之一。“这种‘报格’的断裂现象也说明‘营业化’与新闻事业步入正轨之间未必能够画上等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离开“植根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史实爬梳与分析”,是无法得出这一结论的。本辑“新闻史学”栏目的其他研究成果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特色。

学理探究的深度源自研究者对事物本质而非表象的认识,唯其如此才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形成理性判断。在本辑“传播理论”“新媒体与社会”栏目中,这种认识与判断并不少见。它不仅体现在对传播学学术史及其范式所进行的梳理与反思中(吴靖),对基于传统社会框架的“公”与“私”概念的辨析与重新解读中(胡泳),更体现在超越学科范式的、对于以“国家”和“主权”为名义的传播活动之合法性的探究中(王维佳)。后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和理论辨析试图证明,新的全球传播环境非但没有培育起众所期盼的“全球公民社会”,反而是在不断促成新型的强权支配结构。令编者颇有感触的是,身居国外境外、深谙西学并得传播理论真传的几位国际型学者,在重建“主体性”思维方面,竟与本土学者“隔空对话”,形成了某种共识与互动。譬如在“国际视野”栏目中,台湾政治大学的汪琪教授指出“本土化”研究陷入误区的三个原因:第一,科学主义和西方主义使“非西方”知识失去正当性,使“非西方”在“西方面前失去自信”;第二,教育制度的全球化导致“非西方”失去主体性的基础,造成今天“治西学”以“托西”代替“托古”的趋势;第三,中国的科举制造成研究主体消融于研究客体之中,使研究者失去了主体性。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赵月枝教授更是不无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自我殖民”的问题,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有必要把颠倒了的中外传播研究交流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先生的专访中,他同样强调“为何而写”“为谁而写”以及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

一个学科的灵魂在于能够提出有意义的、值得思考的、可供深入挖掘的问题,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本集刊编辑部试图在这方面身体力行,积极探索,以馈学人,以飨读者。

程曼丽

2013年9月25日于燕园

目 录

传播理论

大众传播行政研究的兴起及其典范化的思想史

|                     |         |        |
|---------------------|---------|--------|
| 考察 .....            | 吴 靖     | ( 3 )  |
| 重思公与私 .....         | 胡 泳     | ( 17 ) |
| “文化帝国主义”过时了吗？       |         |        |
| ——“全球传播时代”的国家、主权与   |         |        |
| 平等 .....            | 王维佳 曹泽熙 | ( 30 ) |
| 理解国际传播的双重视界         |         |        |
| ——基于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 |         |        |
| 分析 .....            | 云国强     | ( 56 ) |

新媒体与社会

|                        |         |         |
|------------------------|---------|---------|
| 新媒介赋权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师曾志     | ( 73 )  |
| 基于兴趣的社会交往：同乡社会网络内的交往逻辑 |         |         |
| ——基于“SZ 人在北京”QQ 群组的    |         |         |
| 虚拟民族志研究 .....          | 高 崇 杨伯淑 | ( 94 )  |
| 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的“广场化”与公民性  |         |         |
| 塑造 .....               | 马长山     | ( 112 ) |

|                        |     |       |
|------------------------|-----|-------|
| 社会冲突性事件中的传媒与公共领域建构     |     |       |
| ——以“乌坎事件”新闻报道为例 .....  | 张 潮 | (123) |
| 中国公益类非政府组织微博研究:基于框架分析的 |     |       |
| 视角 .....               | 刘 静 | (136) |

## 新闻史学

|                          |     |       |
|--------------------------|-----|-------|
| 汉语新闻学的面容、风景及其泥土性         |     |       |
| ——基于大陆“中国新闻史”问题的思考 ..... | 王春泉 | (151) |
| 试论中国媒体的贫困报道 .....        | 陈开和 | (167) |
| 初创期中国电视传播的国际语境 .....     | 常 江 | (183) |
| 《大公报》三巨头清末留日史实考          |     |       |
| ——以《官报》所载为中心 .....       | 王咏梅 | (200) |
| 《密勒氏评论报》专业新闻团队的跨界特征及     |     |       |
| 效用 .....                 | 郑保国 | (213) |
| 论民国时期平津民营报刊营业化转型的局限      |     |       |
| ——以《实报》在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    |     |       |
| 时期的言论为个案 .....           | 李杰琼 | (229) |

## 国际视野

|                        |     |       |
|------------------------|-----|-------|
| 本土化:一个错误的答案? .....     | 汪 琪 | (249) |
| 传播学术的主体性:历史与世界视野 ..... | 赵月枝 | (258) |
| 日本时评的写作与经验             |     |       |
| ——卓南生谈新闻学的教研与实践 .....  | 吕艳宏 | (265) |

# 传播理论

- ▶ 大众传播行政研究的兴起及其典范化的思想史考察
- ▶ 重思公与私
- ▶ “文化帝国主义”过时了吗？  
——“全球传播时代”的国家、主权与平等
- ▶ 理解国际传播的双重视界  
——基于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分析



# 大众传播行政研究的兴起及其 典范化的思想史考察

吴 靖

**内容摘要:**在大众传播研究的思想史中,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的对立已经成为一种经典叙事。本文试图追溯机构建立和话语建构的历史细节,从学术话语背后的历史环境、思想流派、社会资本等方面考察行政研究范式确立的过程中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方法之间的互动,为当下的传播学学科反思提供思想史的线索。

**关键词:**大众传播;行政研究;批判研究;思想史

20 世纪 30 年代,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爆发,一战后十年间欣欣向荣的景象几乎是瞬间蒸发,社会一片阴霾,阶级和族群之间的矛盾激化,资本主义引以为荣的自由企业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的对象既来自激进主义者,也来自试图以改良的方式促使社会进步的知识与行政精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时已经存在了将近二十年,经过初期的战争、动荡与调整,正处于社会稳步发展的阶段。面对西方的社会与经济危机,苏联的制度与文化成为知识阶层向往与学习的对象。在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实行了罗斯福新政,这是一种调和与改良理念的产物。自由企业的基本制度被保留,但为了平衡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和动荡等社会问题,政府从立法、监管、社会服务、公共教育、福利救助等各方面积极介入社会管理。更积极的政府角色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为政府提供建议、咨询或者干脆成为政府或其他公共组织的雇员。官僚体系便随之膨胀。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新政使得政治与知识精英得以与经济精英共同分享与分担社会统治的权力与责任,由于他们之间在意识、目标和管理社会方式上的差异,形成了某种制衡和互补,但同时也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在管理大规模社会行动的方式上,苏联与美国似乎殊途同归,都走向了官僚体制。

刚刚兴起的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了用武之地,以大众传播为例,对宣传、传媒的社会影响与效果和受众爱好、兴趣等的调查与了解,成为从政府到商业机构等各种大型组织迫切需要掌握的知识。各种社会调查机构、研究所迅速出现,它们很容易得到政府、公司和基金会的赞助,吸引了许多致力于发展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心理研究的学者。大众传播研究主流实证学派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大众社会理论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是这类研究的共同认识论前提,即社会成员被默认为离散的和个体化的,而左右人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实验与数据处理方法的改进而得到分离和准确的认识。这样,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上社会行为的规律和发展方向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预测和干预。官僚制倾向于根据事实、效果和效率等工具理性的标准来运作,至于目的、价值、正义等价值理性层面的思辨通常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以外。社会科学致力于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前者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范畴而后者最好归为形而上学,属于学术以外的关怀,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与价值中立的立场恰恰与官僚制的认识论相一致。两者的联盟是历史的必然。

### 一、大众传播研究机构的兴起与传播学史的典范化

有关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先行者和典范形成的历史叙述,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其1997年出版的遗作《传播研究在美国的起源:个人的回忆》(*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中所讲述的四位“先驱”(forefathers)成为最为广泛接受的说法。施拉姆对20世纪50年代后传播研究在美国大学中的学科化和机构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传播学的“奠基人”(founding father)。由奠基人所指认的“先驱”自然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今天

年轻一代的学者可能会对这种在视野和性别上都略显狭窄的历史叙述有所不满,但对于大众传播经验研究的谱系而言,这样的总结基本上是实至名归的,他们四位各自的研究项目和研究实践大致奠定了后来大众传播研究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四位传播研究的“先驱”分别是政治学家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 1902—1978)、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 1901—1976)、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 1890—1947),以及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Carl Hovland, 1912—1961)。拉扎斯菲尔德和卢因是逃离纳粹迫害的欧洲移民,拉斯维尔和霍夫兰出生在美国。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欧洲尤其是德国移民的贡献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不论是所谓的行政研究还是批判研究,社会心理学视角还是阐释与文化的视角,纳粹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对学者的境遇、思想以及研究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位传播研究的先行者在学术脉络上各有专攻,传媒或者大众传播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当面对各自的研究问题时,传播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拉斯维尔是政治学者,他对权力和政治过程对人类的影响有着宏大的、历史主义的兴趣。在当代政治中,宣传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无论是在所谓的民主社会还是威权或专制社会,宣传都是政治领袖或组织试图克服社会离散和多元化对政治目标的束缚的有效工具。对宣传机制和宣传手法的研究兴趣使拉斯维尔开始关注宣传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1926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战争时期政府宣传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论文于次年出版。论文对一战期间各国主要报刊中的战争宣传做了系统的研究,从宣传的组织、对象、内容、手法、修辞、条件等做了分类梳理和分析。这是最早的一部系统研究宣传和对传媒内容进行定量分析的著作。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对社会科学的期待:

现代公共舆论与传播研究是在一系列有利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与物理和生物等兄弟学科相比,不得不感到低人一

等。许多社会科学的领导人物都认为,除非研究社会的专家们能够将他们的假设和立场“数据化”,他们在世俗知识的宇宙中就摆脱不了二等公民的命运。(Lasswell, 1972, pp. 301—302)

大众传媒中的符号世界成为拉斯维尔实践量化研究的场所。在此之前,进步主义学者们已经指出了符号体系在社会组织中的核心作用,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提醒人们去关注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的塑造与影响,最著名的当然是李普曼和他的《舆论学》。李普曼提出了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而第一个开始实践的是拉斯维尔,并且在他整个研究生涯中,他都持续着从那篇博士论文开始的研究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都加入了战时的政府部门,为战争服务。拉斯维尔主持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个项目,研究世界革命中的宣传。战争结束后,他又受邀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个相关项目的主任,研究对象是世界各国的宣传符号以及各国精英的态度。他和小组成员研究了各国的重要报纸,在研究生和助研的协助下,进一步实践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即用数据的方式系统地呈现大众传媒中特定的内容。除了内容分析,拉斯维尔对传播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将传播研究的领域描述为“谁,说了什么,对谁说的,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了什么效果”。(Who says what to whom through what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 (Lasswell, 1948)这段描述以线性的传播过程为框架,基本总结出了大众传播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媒介组织与技术、媒介效果。

卢因和霍夫兰是两位心理学家,前者关心社会情境——包括组织环境和人际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与塑造,而后者致力于寻找特定的刺激源影响个体行为的不同方式。卢因是四位“先驱”中最年长的一位,移民美国之前就已经是欧洲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从物理学新兴起的场域理论中获得灵感,试图用“场”(field)这个概念来描述影响个体行为的所有复杂变量的集合。卢因总是试图避免对个体行为的心理机制进行简单化的理解,他用“生活空间”(lifespace)来解释在人的生活场中存在的完整心理环境,即“所有一个人在特定时刻遇到的所有事实、关系与力量”,这些包括“需求、目标、无意识、记忆、信仰、政

治、社会与经济事件,以及任何有可能对行为有直接影响的事务”。(Marrow, 1969, p. 35)相应地,卢因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就倾向于使用微观的、观察的和阐释的方法。他很少使用大规模的样本,更愿意对少量样本进行深入的解读。他也使用很少的实验设备,而是采用直接与人们进行交谈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行为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他喜欢用典型案例和情景分析而不是数据来说明问题。虽然他大学时的专业是数学,思维方式也带有数学的严谨性,但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几乎从来没有用过统计的方法。(Schramm, 1997, p. 77)也许是和他的年龄相一致,卢因是四人中最有欧洲味道的学者,他相信深入的思考、深刻的洞察力和对潜在现象的挖掘能力,而不是将表象机械性地记录下来的“科学”方法。年轻一代和美国社会对新出现的统计工具的迷恋,并没有左右卢因的研究趣味。移民美国之后,他在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的儿童福利研究基地进行他的教学和研究,也参加了一些有实用目的的研究工作,比如二战初期的食品习惯研究,这个研究试图发现什么因素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帮助联邦政府教会人们如何节省食物,例如改变不吃动物某些部位的习惯。(Schramm, 1997, p. 80)卢因坚持使用观察、交谈和深度分析的方式来了解人们行为的复杂动机和影响这些动机的因素,不论是对食物的选择还是对群体目标的忠诚度。爱荷华的研究机构使他转向对儿童这个特定群体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学生们逐步发展出以群体为单位的研究方式。“群体”成为研究个体“生活空间”的具体场所。群体的特征、群体成员的关系和交往方式、群体的决策风格等等,都会对群体成员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其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即对群体特性与风格的研究是了解个体行为的基础。卢因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为传播研究中的组织和小群体研究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小群体研究仍旧主要以社会心理学为理论框架,它将人际交往作为影响和塑造个体行为的主要参考变量。

如果说卢因有点像欧洲遗老,霍夫兰就是美国的青年才俊。这个芝加哥本地的青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实验心理学,1942年,他受邀到华盛顿主持军方的宣传与态度转变的研究项目,那时他才三十岁,已经是著名的实验心

理学家了。在战争的环境下,军方的项目有非常直接的目的,那就是要知道如何提高士兵的士气。霍夫兰在华盛顿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他有充沛的研究资金可以调用,还有被爱国主义召唤而来的各地的知识精英在一起合作。(Schramm, 1997, p. 92)他主持的研究课题是分析美国政府投资拍摄的七集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对鼓舞士兵士气的效果。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任总导演的《我们为何而战》是纪录片和宣传片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它在文献剪辑、说服方式、形式风格等方面都与当时已经非常发达的纳粹德国的宣传片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当然,美国政府并不会满足于对影片艺术魅力的认可,它需要确切的数据来证实影片的宣传效果,因此,是霍夫兰这位实验心理学家,而不是文艺批评家,主持了这项研究项目。研究者用对比实验的方法将影片中的说服策略分离出来,分别检验它们的效果。比如,是直接说明观点,还是让观众推论出观点更加有效?在宣传某种立场的时候,是只讲自己一方的观点,还是将双方的观点都列出来更加有效?宣传者在受众心目中的信誉对宣传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以后,研究者将受众的特征进一步区分,以考察不同受众对同样说服手法的不同反应。霍夫兰小组的研究拥有非常有利的条件,除了充沛的研究资金以外,由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士兵,他们在许多社会条件上的一致性和纪律性也是实验能够得出明显结论的保障。战后霍夫兰在耶鲁主持自己的研究所,继续传播与态度改变的研究。实验的方法必须将现实中复杂的情况进行简化、隔离和区分,以便逐一观察特定的传播内容或方式对特定受众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各种干扰得出有效的数据。但正因为对干扰的排除,实验的方法就很难在自然状态下观察传播与个体态度形成与改变之间的关系,而现实中的传播是一个连续的、交织的复杂过程,对任何一个变量或干扰因素的省略,都会得出过于简化甚至偏颇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在传播研究的历史上很少有霍夫兰的军队研究这样能够明确证实传播效果存在的研究项目。

四位“先驱”中最后要讨论的是拉扎斯菲尔德,而他是四人中与大众传播研究关系最近的一个。所谓大众传播研究的行政研究传统,就是在以他为核心的研究项目中形成的。拉扎斯菲尔德是奥地利的社会

心理学家,逃避纳粹迫害到美国之后就一直在主持传播研究项目,最初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项目(Radio Research),1940年他受聘主持在纽沃克大学(Newark University)的大众媒体研究项目,1941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执教,与默顿(Robert K. Merton)一起建立了著名的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for Applied Social Research)。拉扎斯菲尔德是一个方法论者,在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中发展和精进了以抽样问卷和统计为主要工具的社会调查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完全离开了大众传媒效果研究,转而进行其他的社会调查研究。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者和导师,他所主持的研究项目容纳了许多像他一样流亡到美国的学者,包括与他研究范式相抵牾的人,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而传播效果研究在美国大学中遍地开花,也有赖于他和学生们在这个方向上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拉扎斯菲尔德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在大学时就参加了青年社会主义组织。当时维也纳的年轻社会主义者们都对心理分析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致力于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心理分析是进入工人内心的工具。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接触了美国式的市场研究,对此很感兴趣,他认为在说服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和说服选民投社会党的票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社会调查的方法对两者都有帮助,何况市场调查更容易获得资助,而在完成调查的同时,学者可以利用同样的数据来分析自己的学术问题。(Schramm, 1997, p. 47)

## 二、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范式下的传播研究

通过对传播学四位“先驱”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传播研究的主流学派主要是在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式下提出问题、组织研究的。为了了解这类研究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成果,我们首先要简述一下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这两种理论范式,以及统领它们的哲学框架——实证主义(positivism)。所谓实证主义,是指19世纪到20世纪初社会科学形成初期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孔德将知识的历